

[文章编号] 1005-1597(2022)03-0068-08

# 陈云与新中国石油工业

■ 房 中

【摘要】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在国防建设、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工业。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非常重视石油工业建设。他关心从旧中国接收的老油田的恢复与发展，帮助甘肃玉门、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油田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积极推动地质勘探和石油资源开发，推动克拉玛依等新油田的建设；指导建立新式炼油厂，关注人造石油加工工艺，并较早关注到了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重视建立强大的石油工业队伍，在接收旧中国技术人员、聘请外国专家、建立专业院系等方面作出过重要指示。陈云为石油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陈云；新中国；石油工业；地质勘探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在国防建设、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中，有着广泛的使用。石油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先行工业，其发展快慢直接关系到国家重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速度。1949年中国原油产量只有12万吨，经过艰苦的奋斗，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实现了石油自给的历史性转折，到1978年，原油产量更是突破1亿吨，跨入世界产油大国的行列。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曾担任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分管过石油工业，为其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一、关心老油田的恢复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下面设置了燃料工业部，主管石油工业等的恢复与建设。1949年11月4日，陈云出席政务院第4次政务会议。在会上，陈云介绍中财委各部将次第举行23个专业会议的安排，其中就有石油专业会议。他说：“召开这些会议是为使各部了解其业务的全盘情况，从而建立其工作的基础。”<sup>[1]</sup>1950年4月，燃料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

[1] 《陈云年谱》（修订版）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确定了新中国石油工业恢复的基本方针，要求“在三年内恢复已有的基础，发挥现有设备的效能，提高产量，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探勘与建设工作，以适应国防、交通、工业与民生的需要。”<sup>[2]</sup>这就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恢复指明了方向。

要推进石油工业的恢复，首先需要有序地接收旧中国的老油田。旧中国天然石油的生产集中在西北，主要有甘肃玉门、陕西延长、新疆独山子三个天然老油田。其中“玉门油矿1949年原油产量为6.9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sup>[3]</sup>。因此，接管与恢复玉门油田就成了重中之重。

当时，接管玉门油田的军管会在恢复油田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军管会决定由军事副总代表焦力人带人找上级汇报。他们找到西北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并向他汇报了玉门油矿遇到的难题。贾拓夫听后说：“玉门油矿是个大企业，西北经济困难，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我给陈云同志写封信，你们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3]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直接去北京，向中央财经委员会汇报。”<sup>[1]</sup>到北京后，陈云安排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见了焦力人等，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明确玉门油田的工作归燃料工业部来管。此后，燃料工业部帮助玉门油田解决了遇到的相关问题，促进了玉门油田的恢复和发展。在铁路修建规划中，陈云也考虑到了玉门油田的实际需要。1950年1月，陈云指出：“天兰线，并在可能时修到玉门油厂。”<sup>[2]</sup>1952年4月，陈云又指出：为了西北石油工业建设所需器材能顺利供应，西北铁路须争取早日通车至玉门。<sup>[3]</sup>根据陈云的指示，1956年7月1日，兰新铁路在玉门提前开通，玉门油田出产的原油得以通过火车外运出去，为加快油田建设提供了保障。1958年6月下旬，陈云还专门到玉门油田视察。在玉门油田鸭儿峡油区，陈云首先参观了一座小型的土法炼油炉，并详细询问了这种炼炉的性能和每天的产量。接着又来到钻探设备的现场，仔细观看了钻杆和钻头，并询问了设备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当时使用的钻杆和钻头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中国还不能生产制造时，陈云对陪同视察的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说：石油工业部可否考虑自己建设一个钻井设备厂，学习和吸取国外的技术，研究、开发和制造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钻井机。<sup>[4]</sup>在陈云的关心下，玉门矿到1960年已建设成为一个拥有地质勘探、采油、炼油、机械修配和科学研究部门的大型石油工业基地。

1948年陕西延长油田解放，并迅速恢复了生产。1951年6月，陈云、李富春在给习仲勋、贾拓夫等的电报中指出：“最近一两年内应首先开发陕北地区，使其早日增加产量，将原油运往上海、大连等地炼制品，以应国家当前

之急需”<sup>[5]</sup>，“为配合西北石油工业的开发计划，铁路之修建当应积极进行，我们即告铁道部予以研究。有关配合西北铁路修建问题，亦望你们予以注意。同时，通往延长及四郎庙之公路，应早日修理，以保证陕北地区之顺利发展”<sup>[6]</sup>。针对旧中国地质专家认为在陕北地区的黑色页岩下没有油层的论断，1952年4月，陈云主持起草的，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名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明确指出，“根据地质工作人员的判断，在延长油田的黑色页岩以下，尚有更好的含油砂层存在”<sup>[7]</sup>。这就否定了旧中国地质专家的错误论断，有力推动了西北油田的开发。到1952年，延长油田年产原油达到756吨。

新疆独山子油田的恢复是同苏联合作进行的。1950年3月27日，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联合创办新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的协定。9月，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正式成立。陈云十分关心独山子油田的恢复。1951年10月27日，陈云等就中苏石油公司今后工作计划及进行空中测量、增加股金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将相关情况电报报送周恩来。10月30日，周恩来回电，同意他们所提意见，“请即复告新疆财委照此执行”<sup>[8]</sup>。经过恢复和发展，独山子油田从只有两口出油井，日产原油2—3吨，到1952年又完成并投产生产井12口，全年生产原油5.2万吨，相当于该油田新中国成立前累计产量的4.5倍。<sup>[9]</sup>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拥有了独立管理石油股份公司的能力。经中苏两国政府商议，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给

[1]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编《百年石油》，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 《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3]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372页。

[4]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永远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72页。

[5] 《陈云文集》第2卷，第265页。

[6] 《陈云文集》第2卷，第266页。

[7] 《陈云文集》第2卷，第369页。

[8]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73页。

[9] 参见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编《中国工业五十年——新中国工业通鉴（1949—1999）》（第9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中国。<sup>[1]</sup>同年12月31日,中苏石油股份公司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新疆石油公司。

经过努力,老油田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并带动石油工业整体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原油产量的3.6倍,为旧中国原油历史最高年产量的1.3倍。生产汽、煤、柴、润四大类油品25.9万吨,比1949年提高了6倍多。<sup>[2]</sup>

## 二、推动地质勘探,开发新油田

我国幅员广阔,从地质构成上看,可能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这就需要加大勘查,发现更多的油田。为了加强对地质勘探工作的领导,1950年8月25日,政务院第47次政务会议批准成立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任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在中财委的指导下开展工作。陈云后来回忆说:“新中国设立地质部比较早,中央很重视地质工作,经常过问地下勘察的进展情况。”<sup>[3]</sup>

陈云十分关注地质勘探和新石油资源开发工作。1952年5月,在谈到当年财经工作的重点时,陈云明确指出:应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什么是工业?他概括道:“戳穿西洋镜来说,工业是一个叫‘地下’,一个叫‘机器’。”<sup>[4]</sup>“地下”指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石油、煤炭等地下资源的勘察与开采。在陈云的积极推动下,1953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燃料工业部党组《关于目前燃料工业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报告》,并作出明确指示:“必

须把地质勘探工作提到首要地位,必须采取一切有效办法,迅速加强地质勘探力量,并做好基本建设工作。”<sup>[5]</sup>

1954年6月29日至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陈云在会上说:“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sup>[6]</sup>对重工业中存在的石油工业发展赶不上需要的问题,他说:“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的问题。只要发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sup>[7]</sup>11月15日至25日,在陈云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讨论“一五”计划草案会议。会议讨论最多的是石油、农业、交通三个问题。陈云在发言中介绍了石油问题的现状和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他说:“石油不解决是个严重问题。1954年已进口10万吨,今年还准备进口27万吨,明年要进口170万吨,运输是个极大的问题。石油只要找到资源,投资就满足它。”他还指出:“石油的地质工作不能单靠石油局来搞。地质部应列入计划,把力量转到石油地质上。晚搞不如早搞,燃料部、地质部要同专家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国防上、经济上都很重要。”<sup>[8]</sup>根据陈云的意见,“一五”计划对开发新油田作出了明确规划,特别指出:“在甘肃、新疆、四川和青海等地区大力地进行地质工作和钻探工作,尽可能地获得更多的天然石油的储藏量”,“积极地开发新的油田”。<sup>[9]</sup>

为了落实“一五”计划的要求,加快石油工业的发展,1955年7月,国家决定成立石油工业部,由李聚奎任部长。10月29日,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勘探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

[1] 参见《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2日。

[2]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第22页。

[3] 《陈云年谱》(修订版)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4]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15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4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6]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02页。

[7]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页。

[8] 《陈云传》(下),第909页。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3页。

油田出油，揭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序幕。11月，陈云、李富春召集石油工业部负责人会议，指示要加强克拉玛依的勘探工作。<sup>[1]</sup>12月中旬，李聚奎等来到现场指导工作，传达了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此后，克拉玛依勘探成果不断扩大，引起陈云的关注，他“有好几个晚上在深夜12点以后，直接给石油部勘探司副司长沈晨打电话，亲自询问每口井的情况和远景”<sup>[2]</sup>。接着，陈云等又批准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在独山子到克拉玛依之间的广大地区内，集中力量，大力勘探的报告。<sup>[3]</sup>之后，经过大规模钻探，1956年9月，有23口钻井喷出了石油。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年产原油33万吨，1960年达到163万吨，占1960年全国原油产量的39%，是大庆油田发现以前全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sup>[4]</sup>

1956年1月下旬，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总结1955年工作，布置1956年工作。会议期间，陈云找李四光谈话，详细地询问了石油地质普查的情况。2月4日，李四光就如何在总结过去所获得的勘探成果的基础上，在选定的油区内迅速发现油田，从而对我国天然石油远景作出可靠的评价的问题，向陈云作了书面报告。<sup>[5]</sup>

1956年2月26日，毛泽东、陈云等听取了李聚奎和康世恩的汇报。在听取汇报时，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需要一个县发一台钻机，叫他们到处凿一凿。<sup>[6]</sup>毛泽东的意思是，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56年3月初，陈云指出：“地质部与石油部

要适当分工，密切合作，团结一致，发挥两个部的积极性，迅速找出油来。”<sup>[7]</sup>3月6日，陈云召集地质部、石油工业部相关人员进一步研究关于加强石油勘探的意见。他提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sup>[8]</sup>经过对我国多年勘探所取得资料的分析和研判，3月16日，石油工业部党组在给毛泽东、陈云的报告中提出：“中国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要大力加强天然石油勘探，满足人民经济需要并争取在两三年内，在包括松辽平原在内的几个地区找到一二个大油田。”<sup>[9]</sup>

1957年4月29日、5月8日，陈云两次会见苏联石油工业部的代表团，跟他们谈有关中国石油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事后，苏联石油工业部代表团就陈云提出的问题作出了书面答复，指出“中国西北地区石油发展的良好前景和四川天然气开发、石油钻探的前景”，建议“加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的地球物理研究和勘探工作”。<sup>[10]</sup>5月19日，陈云将这一书面答复批转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此后，陈云仍然关心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1958年3月31日至4月2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经济工作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石油生产问题。<sup>[11]</sup>1958年6月8日，陈云到石油工业部参观石油样品展览，同时听取石油工业部领导的汇报，研究、部署如何发展石油工业，建立自己的石油基地等工作。他指出，一个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量石油，要依靠自力更生。<sup>[12]</sup>

经过几年的勘探工作，我们对我国东部地区含油远景有了一定认识。石油工业实行战略转移，把找油找气的重点从我国的西部转到了

[1]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克拉玛依文史》第6辑，1990年印行，第108页。

[2]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编《百年石油》，第41页。

[3]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克拉玛依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克拉玛依文史》第6辑，第108页。

[4] 参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编《百年石油》，第44页。

[5] 参见陈群等编著《李四光传》，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6] 参见温厚文：《康世恩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初创》，《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7] 石宝珩：《石油地质论文辑录》，地质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8] 参见《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第633页。

[9] 石宝珩：《石油地质论文辑录》，第260页。

[10] 《陈云年谱》（修订版）中卷，第541页。

[11]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版）中卷，第580页。

[12] 参见黄时进编著《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1949-2009）》上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2页。

东部。1958年8月,石油工业部设立华东石油勘探局。1959年9月,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境内的一口探井喷油,依据这个地区的区域地质勘探资料,松辽盆地北部很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196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这场会战是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进行的。会战的第一年打了一场艰苦的勘探战,基本探明了油田的面积和储量。随后又用了两年时间,基本建成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实现了我国石油的基本自给。1963年12月,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sup>[1]</sup>同时,《人民日报》发表消息说,“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sup>[2]</sup>。

### 三、指导建立新式炼油厂

石油工业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仅仅靠地质勘探、油田采油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原油进行再加工。这就需要建设新式炼油厂。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决定利用接管的国民党政府原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上海营业所高桥东厂,筹建上海炼油厂。1950年6月1日,上海炼油厂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炼油厂,隶属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领导。“一五”计划期间,该厂炼油加工能力与国家供应的原油量不相适应,于是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改造扩建炼油装置。1957年11月至12月,陈云在上海疗养,但仍一直惦记着“一五”计划期间上马的已经建成投产的重大建设项目。期间,他视察了上海炼油厂,了解军用油生产情况和热裂化生产装置所需特殊钢材、仪表供应等情况,还勉励上海炼油厂的职工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努力奋

斗。<sup>[3]</sup>经过多次扩建,到1958年,上海炼油厂原油年加工能力达到50万吨。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北地区的原油是运输到上海等地加工的。但是,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运输设备落后,在运输过程中既耗费了一定的人力、财力,又会损耗一部分原油。为此,陈云提出,应该就资源产地建设炼油厂。1952年4月,陈云在主持起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靠近玉门油田建设新式炼油工厂的问题。报告指出:“计划建设年处理三百万吨原油的新式炼油工厂。即以酒泉、潮水两盆地内探勘成功的构造,作为供给炼厂原料的来源。”“关于三百万吨的炼油厂厂址,设兰州或兰州以西的张掖?是一期建成或分期分步建成?工厂内部的安排如何经济与合理?产品的种类及生产方法等问题,须待苏联设计专家到来后,才能确定。”<sup>[4]</sup>中财委还就相关情况向中央作了口头报告,并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委托其进行设计工作的请求。经过多方考虑,新式炼油厂确定选址兰州。

陈云一直关心、指导兰州炼油厂的发展和建设。20世纪50年代中期,兰州炼油厂急需一批安装钢材,并要向国外订货。石油工业部就请示报告:安装钢材向国外订货已等不及国家计委汇总后再提了,应迅速提出,以保证施工需要。1956年1月11日,陈云将石油工业部这一请示报告批送时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说这一订货是需要的,请斟酌办理。<sup>[5]</sup>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下,兰州炼油厂1956年4月开工兴建,1958年9月正式投产。这是中国第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炼油厂。

1958年6月,兰州炼油厂投产前夕,陈云专门来到这里考察。他听取了厂负责人的汇报,考察炼油厂的车间,询问车间的生产情况。当他问起石油副产品的情况时,技术人员拿出几种石油副产品的样品给他看。他看后说:外国炼油副产品有十多种,用途极广,价格也不高。

[1] 《周恩来传》(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7-1488页。

[2] 《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返 我国石油产品基本自给》,《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6日。

[3] 参见《上海炼油厂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炼油厂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4] 《陈云文集》第2卷,第370页。

[5] 参见《陈云年谱》(修订版)中卷,第420页。

我们应该研究、开发石油副产品，迎头赶上外国的技术水平。我们不但要炼出汽车用油，还要炼出高级汽油供飞机使用。他还建议：有条件的话，炼油厂一定建立在油田附近，减少中间运输环节，降低石油成本。石油工业部要建立研究机构，集中科学技术人员对石油开采、提炼、设备制造等环节进行攻关，为我国石油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sup>[1]</sup>

除了天然石油炼油厂，陈云还十分重视人造石油加工工艺研究。根据陈云意见，“一五”计划明确指出：“充分地利用抚顺等地现有页岩油和煤炼油的设备”，“配合原油生产的生长，努力地增加石油加工的能力”。<sup>[2]</sup>《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也强调，“应当加强人造石油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包括油页岩干馏和页岩油加工工艺的研究”<sup>[3]</sup>。这就是说，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油页岩资源，进行页岩干馏人造油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积极发展中小型页岩油或煤炼油装置，进行页岩干馏和煤干馏，生产人造油，以缓解油料紧缺的矛盾。1956年施工、1959年完工的抚顺第二制油厂就是根据这一需要改建的。完工的当年，年生产能力即达到页岩原油70万吨，占同年全国人造石油产量的80%。1959年10月，陈云在东北考察时，考察了抚顺石油二厂，并在回京前听了抚顺市委的汇报。此外，1958年4月，石油工业部机关还动工兴建了页岩干馏小型示范厂。这座厂坐落在石油工业部办公大楼右侧马路旁，由石油工业部北京设计院设计，包括页岩干馏和焦油加工两部分，可得到汽灯油、轻柴油、粗蜡、焦炭等产品。1958年9月，陈云来到该厂考察，极大地鼓舞了石油工业部机关同志。<sup>[4]</sup>

在指导石油开采、炼制等生产的同时，陈

云还关注到了石油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1970年，国家地质总局在苏20井的钻探中发现了油层，日产油12.8吨，成为苏北地区第一口发现井。江苏出油后，开展了石油会战。1975年7月19日，陈云到扬州视察工作时专门来到会战前线，视察真武地区58号和61号石油钻井，指出：对地下情况的认识是逐步来的。江苏除了陆上还有海边，远景是好的，你们要准备做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不要一碰到困难就灰心”。但他同时强调：“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后再解决。”<sup>[5]</sup>陈云在1975年就注意到了石油工业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充分说明了他考虑问题的前瞻性。

#### 四、重视建立强大的石油工业队伍

石油工业的发展，要有强大的石油工业队伍作为支撑。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石油工业人员严重缺乏。1949年末，“全国石油职工人数只有1.1万人，其中技术干部约700人，管理人员600多人。在技术干部中，从事石油地质的技术干部仅20余人，钻井工程师10余人”<sup>[6]</sup>。对此，陈云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必须承认，地质工作人员的数目不多，本领不够。这责任不在于地质工作人员，中国并不是不能造就出有本能的地质工作人员，而是因为过去没有良好的环境。”<sup>[7]</sup>他要求：“为迎接大的发展，必须提前培养充足的干部及技术工人。”<sup>[8]</sup>

为了解决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首先就需要使用好旧中国留下来的技术人员。陈云说：旧中国留下的技术人员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sup>[9]</sup>。新中国建立后，西北玉门、延长油矿及东北小丰满发电厂等处工作亟须开展，

[1]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永远的陈云》，第473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第53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58页。

[4] 参见丁连胜：《陈云与石油工业》，《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5] 《陈云年谱》（修订版）下卷，第218页。

[6]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石油工业》，第19—20页。

[7] 《陈云文选》第2卷，第185页。

[8] 《陈云文集》第2卷，第266页。

[9] 《陈云文选》第2卷，第46页。

而技术人员非常缺乏。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石油及水电专业人员多留在华东，而华东当时并无油矿及水力发电站。陈云于1950年1月致电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曾山，提出：“目前情况，以将这一批专门人员放到有实际业务工作的地方为好。我意将他们全部调来，交燃工部统筹分配。”<sup>[1]</sup>

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支付一定的费用聘请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建设石油工业。陈云就此指出：在若干年内，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没有培养出来以前，“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sup>[2]</sup>，“把资金用到去请苏联派成套的专家来勘察，这种用钱的办法是得当的”<sup>[3]</sup>。1952年，他提出：“现有石油工业基础十分微弱”，“必须聘请一批苏联专家来帮助解决有关管理工作、新建及技术问题。一九五二年内需聘到三十四人，其中地质九人，采油三人，钻井二人，炼油一人，地震探矿九人，重力探矿五人，救援五人”。<sup>[4]</sup>1954年11月18日，陈云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草案会议上又提出：我们需要石油数量很大……要请苏联派许多成套的人来，帮我们。<sup>[5]</sup>经与苏联洽谈，从1955年起，苏联派出地质勘探、开发、炼油等成套专家并组成专家顾问组来到中国帮助发展石油工业。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9年，先后有434名来自苏联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受聘担任中国石油系统的技术顾问。<sup>[6]</sup>这些专家来中国，帮助中国石油工人提高了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促进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陈云强调，在使用原有技术人员和聘请苏联专家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自身技术人员的

培养。1950年4月，第一次全国石油工业会议建议教育部在高等院校设立石油科系。为贯彻全国石油工业会议精神，燃料工业部委托清华大学等定向培养地质、物探、采矿专业人才。8月，经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批准，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决定在华东、北京、兰州、西安等地开办地质勘探、地球物理、测绘、炼油、钻井等专业训练班。1951年6月，陈云在谈到为西北石油工业培养干部的问题时指出：“除中央指定若干国立大学设立石油专系外，西北工学院是否可以培养石油干部为主，并帮助西北石油管理局办好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及各种训练班。”<sup>[7]</sup>根据这一指示要求，西北石油管理局筹建西北石油工业专科学校，以培养紧缺技术人员。1952年4月，陈云在主持起草的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名义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再次指出：“拟将现在的西安石油学校（前身为西北石油工业专科学校——引者注）三百人扩大至一千二百人，并将其改成为速成性质的石油干部学校。拟增加玉门、上海、大连等炼厂的技工数量，以便培养新的大炼油厂的技工。”<sup>[8]</sup>

在石油工业队伍中，地质人才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为此，陈云发出了“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sup>[9]</sup>的号召，他还提出了加强地质队伍建设的三条途径：一是通过兴办地质院校和训练班以及专业人员带徒弟的办法，迅速壮大地质工作力量。二是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对新老人员、室内工作和室外工作人员、老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合理组织与调配，合理地使用现有地质人才。三是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向左右、上下学习，向苏联经验学习，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sup>[10]</sup>由于方针明确、办法得当，北京、长春地质学院和十多所地质专业的中等技术学校相继开办，地质工作队伍很快地成长壮大起来，为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1] 《陈云传》（上），第687页。

[2] 《陈云文集》第2卷，第358页。

[3] 《陈云传》（下），第909页。

[4] 《陈云文集》第2卷，第371页。

[5] 参见黄时进编著《新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发展史（1949-2009）》上册，第232页。

[6] 参见宫柯：《三次引进成就了中国石油工业》，《石油知识》2019年第3期。

[7] 《陈云文集》第2卷，第266页。

[8] 《陈云文集》第2卷，第371页。

[9] 《陈云文选》第2卷，第182页。

[10] 参见《陈云传》（上），第829页。

“一五”计划时期,石油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1957年,石油职工总数增加到了14.1万人,其中,石油勘探方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有4.6万人,比1949年增加了8倍多。<sup>[1]</sup>这不仅保证了这个时期石油工业建设对技术人员的需要,而且为以后石油工业发展作了一定准备,为更大规模的石油工业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石油工业队伍遭到了破坏,再加上一些油田产量快速递减等问题,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原油产量不增反降。1979年3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就国民经济调整作了系统发言,在讲到工业调整时,他提出可以利用外国技术来培养中国的技术人才,发展中国石油工业,他说,“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sup>[2]</sup>。此后,为了有效处理从野外采集的数

据,从而提高石油钻探精确度,石油工业部从国外租用了一台3033计算机。此外,石油工业部还与几家外国公司签订了勘探服务协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勘探水平。这一系列的举措,推动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恢复、探索、开拓,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陈云一直关心、关怀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他从中国国情出发,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推动石油工业发展的主张和举措,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房中,陈云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上海201715〕

(责任编辑:茅文婷)

[1] 参见《余秋里传》,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页。

[2]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要目

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两个确立”的确立过程及决定性意义 (曲青山)

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意义与任务 (朱佳木)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的创立及其影响 (毕亚娜 邓美薇)

监督法从酝酿到出台的历程考察 (刘维芳)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购销探析 (常明明)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理念的演进历程 (张连辉 李进纬)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李明楠)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储著武)

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郭旭红 武力)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的多重探索 (唐仕春)

1959-1965年上海工业企业“比学赶帮”运动研究 (陈碧舟)